

幸存者

北京青年新锐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王 荒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有口锅，供作家们舀饭吃。

我守在锅边，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也干过，漏过，糊过，也挨过砸。舀饭的也多有不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转身就赶车上路——也许是锦绣前程，也许是歧路迷津，也许无非浪荡江湖。日长月久，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

新近，这口锅添水添米，架笼架屉。热气腾腾里，新星如云，高手若霞，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

锅边屉下，耄耋暂未耳聋，听见一位作家说：凭良心。这话谁也熟悉，且还是一句俗话，干什么的都可说，不干什么的也可说。

作家说凭良心，指的是写作的依靠，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

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天天可写，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或是无可奈何。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钉在锅边打听写作，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人说底上也就是真情实感，我相信上了，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

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当然以情动人，要不，还有什么文艺呢？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从何说起？多年来，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只因座位的距离、角度，还有心

性倾向不一样。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临门一脚是绝活！乙看见了犯规动作，上帝的第三只手，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

山灾海难，风哭雨号。多少关头、转折、高潮、旋涡、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不真说；多少感、多少情说不实，不实说。作家呀，偏偏说话是天职，也是本事，他扭头去说一盘棋、一场球——谁能说谁白吃饭呀！

一位小说作家，善写高大山川，气韵浩荡，新近忽然说，不写小说了。听后诧异，他也只解释：写散文，不写小说。

我疑心他要真要实，要展开历史，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小说的虚构手段，借人说事、借事说人的绕劲儿，叫他腻歪了，倒稀罕上真的难度、实的重量。当然，只是我的臆测。

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抽刀断水，水不断流逝，逝水不能复现。作家不能真实，只能真诚。真实一次性，真情可从容可执著，如同轮椅上的修炼。

真实是客观的话，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大声报告：向内转。到了世纪之交，走向内心世界，排山倒海；内宇宙、器官反映、第六感、下意识，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私绝密，这就另当别论也罢。

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她们做梦：物欲的梦，性灵的梦，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

我久读其中的一位，也愿意写写感想。但几次动笔，都遇难而

退，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肝胆不适应？

作者敞开心扉，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有了共鸣，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了共鸣，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

细想，原来得到共鸣同时，也有曲折。从“梦”如流之中，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称赞今日梦之美。这是怎么了？认真较真，惟有昔日贬词，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

是什么词，有什么曲折？词有多个，在感想遇难中间，反复挑剔，精简成八字——

想入非非。无所事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溃散的作家余勇，收容在重新点火的锅旁灶下，不免反思来路，以《金光大道》《创业史》为题来说事儿。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别无抓挠，这题目现成，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本该高兴，不料也有曲折。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早成路线，叫做极左。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有的敢怒敢言：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稍稍冷静，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饿着还眯着，政策一变，包产到户，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生活不从“创业史”过来，运动才走“金光大道”。运动和生活脱节，有时候还背道。作家耗尽青春，厮守孤灯，枷首爬格子，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昨天源出真情实感，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这可如何、怎生、哪能接受得了！

转眼进入新世纪，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安息吧，事情

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爱题“生逢其时”、“生正逢辰”，正、反、贬、颂，尽收葫芦中。

“想入非非”做的是反弹的梦。标榜真实，倒成瞒骗。虚构梦幻，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无所事事”不事口号标语，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图解，任凭梦境寻寻觅觅，此情此感犹如“太虚幻境”门联上的真、假、有、无。

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市场吆喝声中，锅里热气蒸腾，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男女双赢。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小说没人看了，不好卖了！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玩儿，玩儿玩儿！”也有唉声长叹：怎么写都成，怎么写怎么是。真个是“你一元，我一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元”。

说似无意，正好踩着点子：多元时代。历来一元化，化到一元独“革”，迈不开步，憋得僵化了。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只有市场嘈杂。

大耄的耳朵，爱听“凭良心”这样老掉牙的话，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做伴而来的是告诫：回归本身，梳理来路，温温“写什么，怎么写”。古人云“饮水思源”，今人说“源头是本质”。

开锅蒸馒头，若问老起子，有史为证：

道听途说，异闻奇谈。

若问新苏打，姑妄杜撰：

上下求索，左右逢源。

东西撞击，出入平安。

新陈代谢，起居百年。

内 容 提 要

《幸存者》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91夏天的某一个星期之内。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小说的主人公曾善美经历了一连串的意外。这些意外事件其实都是转型期社会的典型事件，带有正邪难辨的色彩。而对曾善美这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女青年来说，几乎每一个事件都带有人生选择的意味：是放纵还是自制？是忠诚还是背叛？是进取还是堕落？是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坏人”？

曾善美在《幸存者》中的七天，与《圣经》中上帝创世纪的长度相同。她之所以能度过这艰难的七天，并非因为她更坚强更聪明，恰恰相反，是因为她比别人更木讷，更不敏感。小说中，一方面是充满激变、动感、挑战的现实；一方面是曾善美比外界永远慢半拍的心理反应。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构成了“幸存者”的主题。

作者简介

王芄，女，1966年生于北京，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天津市新华中学。1984年至198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多家公司。1997年赴美国留学，一年后未学成即归国。自1990年起开始业余文学创作。2001年起签约于北京作家协会，成为合同制作家。



◎作者近照

第一章

科联公司是一家位于中关村的电脑公司，成立于1988年元月。过了春节，就是龙年。一进入龙年，大江南北陆续发生了几件不幸的事情。比如北方的火灾，比如南方的空难。并非所有的灾难都会给科联的生意带来影响。拿火灾来说，虽然大兴安岭地区的重建必定拉升该地区的购买力，但灾后的重建一定会把重点放在必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上面，而在1988年的春天，电脑是否已经成为了必需品，这是一个问题。此外，就算该地区打算重新配备电脑，这笔预算平均分到中关村如过江之鲫一般的小电脑公司头上，对每家的影响也就微不足道了——就算该地区的电脑全部从中关村进货。倒是发生在重庆的一起空难给科联的生意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科联刚刚成立时，采取的是“零库存”的销售方式。也就是说，逢有客人进来买东西，不论人家买什么，销售员都要先一口答应有货，待人家说

清型号、配置之后，销售员再到两条街以外的一家大公司去提货。科联提的货一多，那家大公司的批发部就给了科联一个相当优惠的折扣，这个折扣价当然远远低于报给普通散客的价格。不过，这一优惠报价只是一个口头协议，是该公司批发部经理和科联严总通过电话交谈而达成的默契。如今，该批发部经理在去重庆出差的时候遇上了空难，新经理在短时间内理不清旧账，也就很难继续承认那个优惠报价了。

这一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来观察一下科联的业务形态。不过我得预先声明：科联的业务形态，分理想和现实两个部分。说到理想，科联公司可是按照现代公司的管理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它的公司章程上，写明了“董事长”、“总经理”的详细分工，写明了销售部、开发部、财务部、人事部等职能部门的存在；而说到现实，空难发生的时候科联只有三个干部：严总、于副总和刘会计，以及销售员若干；只有一个部门：销售部。这种销售部一枝独秀的公司结构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国情之上的：在1988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客户从全国各地涌到中关村来采购电脑。也就是说，中关村的电脑公司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顾客。

这样的业务形态，虽然不占压流动资金，但是自有其脆弱之处，连航空业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到科联的业务流程，于是调整成为必需，而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的。但科联很幸运，没有经历太大的阵痛，这是因为尽管龙年里发生了一些“利空”新闻，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毕竟还是一天天向上。水涨船高，科联的买卖自然会相应地红火。出货量一大，科联也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库存

了，即使人家大公司又恢复了对科联的优惠报价。道理可能是这样的：顾客们接踵而至，如果总是到别人家仓库去穿梭提货，势必会将太多的劳动力消耗在路上，反不划算。就这样，过了1989年春节，科联开始筹建自己的仓库。

这是一个扩张，同时也是一个分裂。从此科联分成了两部分：销售部在中关村大街上，斜对着北大南门。办公室、财务和仓库在中关村宿舍区里，斜对着北大东门。科联的第二次扩张兼分裂发生在一年以后，1990年夏秋之交。那一年，汉字处理成为计算机在中国普及的瓶颈，于是就有一家生产打印机的日本公司主动找上门来要与科联合资，共同开发中文系统软件。科联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好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偏偏严总又是这么一个谨慎的人，没有被好运气冲昏头脑，他不想把整个公司都投进去，只想把开发部交给合资公司。开发部？科联有开发部吗？暂时没有。不过，如果现在抓紧的话，一切都还来得及。

就这样，科联又建起了一个开发部，并且将这个开发部拿出来与日本CAN公司合了资。于是，在北大东门外的科联办公室门口就有了两块牌子，一块是科联公司，另一块是“CANKE”公司。按迷信的说法，“CANKE”这个名字起得可不太吉利，哪有公司愿意遭遇“坎坷”的？但严总偏不信这个邪。他批驳说：“‘科联’还与‘可怜’谐音呢，可我们科联两年来难道不是一帆风顺？”请注意严总的逻辑：两年来的一帆风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了。这形象地告诉我们：中关村是多么年轻。

科联的开发部，也就是CANKE的实体，被设在了北大西门外的畅春园。畅春园里有一个倒闭了的国有商场。这商场是个二

层楼，一层楼租给另外一家公司当仓库，二层楼就租给了科联搞开发。这个商场之所以倒闭，大概是因为选址错误：没有建在畅春园居民去中关村的必经之路上，而是建在了人迹罕至的一条小河的边上。当然，这对于开发来说倒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可以免受打扰。到此为止，科联的三个部门终于对北大校园形成了合围之势。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曾善美，女，1990年夏天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了。她学了四年物理，但是和很多大学生一样，她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打算自主择业，找一个与物理学无关的工作。也就是说，她想跳槽。而她纵身一跳的结果，就是从北大的墙里，跳到了北大的墙外。

那畅春园商场的二楼原先是一个理发店，宽敞大厅的四壁上都镶有镜子。现在虽然不作理发店用了，可是也没有道理非把镜子砸烂不可。整个二楼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内摆着十二张桌子，分成四行，每行三张。每张桌子上有一台电脑，每个电脑前面坐着一个技术员。

电脑公司的电脑和非电脑公司的电脑在外观上有很大区别。在非电脑公司里，电脑是劳动工具，所以外观总是完整的。若是电脑有一点毛病，操作电脑的人——常常是秘书——通常都不敢把电脑打开，看看里面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而在电脑公司，电脑既是劳动工具也是劳动对象，电脑公司的技术员经常要把劳动对象的机箱盖打开，忽而插进一个内存条，忽而拔出一块电路板。为方便起见，劳动对象的机箱盖就很少是扣上的。也就是说，电脑公司里的电脑通常像是手术台上已经被划开了肚皮的病人。这种开膛破肚的惨烈景象，在科联开发部里，经过四周镜子的反

射，其严重程度至少被扩大了一倍。

但是在科联开发部里也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曾善美使用的那台电脑。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1991年7月的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曾善美就坐在这样一台外观完整，机箱盖扣得严丝合缝的电脑前工作着。曾善美是开发部里惟一一个女员工，她所使用的电脑又是开发部里惟一一台“衣着保守”的电脑，这就让人不禁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在干活。打个比方，这好比在骄阳似火的农田里，男人们都在脱光了上衣大干，只有一个妇女，衣着整齐，还打着遮阳伞。她必是来送饭送水的。因此，如果这时有一个不了解内情的外人进入开发部放眼一望，他一定以为曾善美不是技术员之一，而只是开发部的秘书。

但曾善美确实是一个技术员，至于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技术员，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此时此刻，除了电脑的外观与众不同之外，曾善美还有一个怪异之处，那就是：她身上披着一件蓝色劳动布的棉大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在90年代初，有电脑的地方必须得有空调，这是因为那时的电脑比较娇气，必须在恒温恒湿的环境里才能正常工作。不巧的是，那时的空调也比较娇气，动不动就嗡嗡作响，送出强大却又并不规则的冷风。曾有人指出：任何一个细节都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说得真是太对了。不过，闲话少说，1991年7月的曾善美，她在科联开发部里所坐的位置，正好位于那台国产劣质柜式空调的正前方。假如整个大厅里要保持摄氏25度的温度，那么曾善美所处的局部的温度，据她自己说，经常为摄氏7度。

曾善美抱怨空调太冷，已经抱怨了整整一个月，因为没人理

她，所以她昨天回家时取回了这件棉大衣。曾善美回的那个“家”是她父母的家。她平时住在公司宿舍里，只有星期天才回家看看。那件棉大衣是曾善美的妈妈用来压箱底的陈年旧货，70年代工厂里发的劳保用品。深蓝色的劳动布，上面缉着一行行白色的明线。棉花絮得很厚，两行明线之间的棉花鼓了起来，给人一种殷实温暖的感觉。在北方的7月里，对这件棉袄看上一眼都会令人浑身冒汗。所以曾善美的这一举动，无论如何有些出格。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出格举动竟然在开发部引不起任何反响。她的同事们看她一眼，谁也没表示什么，然后就各忙各的，再也不看她了。开发部经理杨老师走到她身边呆了一会儿，问她：“曾善美，热不热呀？”曾善美说：“冷得打哆嗦呢。”杨老师就嘀咕说：“有这么冷吗？你有病吧？”

现如今，“星期一综合征”这个词已经广为人知，很多白领在连续度过星期六、星期天之后，都感到自己在星期一无精打采、情绪沮丧。开发部的人感到工作不像以前那么顺手，总务部的人感觉到电话机不像以前那么好使，销售部的人感觉到顾客们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对付。如果有人指出客观环境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之处，关键是你们自己的情绪有问题时，白领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知道知道。这就是星期一综合征啊！”他们援引这个术语，以证明自己的情绪合情合理名正言顺。而在1991年的那个星期一，曾善美虽然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因为她还听说过“星期一综合征”这个词，所以她就不那么理直气壮。她只是穿上一件大棉袄，以此来表露自己内心的焦躁。

导致“星期一综合征”在1991年尚未广为人知的原因，一

来可能是白领的数量在总人群中还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二来可能是因为五天工作制尚未实行。那时实行的是六天工作制，只有星期天算是周末。既然人们没有在周末享受到如今这般的放松，因而也就不应该在上班后感受到如今这般的沮丧。

那么曾善美的反常情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与“星期一”并无直接的关系。这个周末，她一如既往地回家看父母，她妈妈一如既往地问她：你怎么没出去玩儿啊？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呀！曾妈妈虽然很想在周末见到曾善美，但更希望曾善美能尽快找到一个对象，尽快结婚。曾善美一听这话就烦。想当初曾善美上大学时，曾妈妈多次警告她不要过早谈恋爱，那时的曾善美十分听话，对男生多一眼都不肯看。谁知大学刚毕业，曾妈妈就开始催她结婚了。既然整个大学阶段都敬男生而远之，那么大学刚一毕业，哪儿来的对象可以结婚呢？如此的出尔反尔，怎能不令曾善美恼火。

不过，既然说到了找对象的问题，我们不妨顺便看看曾善美的条件。曾善美今年23岁，身高一米六五，身材中等，不胖不瘦。她的皮肤不算很白，咧嘴一笑的时候，会露出几颗“四环素牙”。她有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她梳中长的披肩发，工作的时候，会用一只老式的橡皮筋将头发束起。这种简陋的橡皮筋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了，曾善美用的橡皮筋都是她在科联的朋友，财务部的辛灵，利用工作之便拿给她的。总而言之，单从硬件来说，曾善美在同龄女子里应该算是中等条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人”。这种“一般人”，如果放在女孩子成堆的地方，比如棉纺厂，找起对象来自自然不太容易。但曾善美却

是在科联的开发部工作，所以在恋爱问题上，她应该不会成为老大难。你看，曾善美所在的开发部一共有十二个人，除了开发部经理杨老师是已婚男子，其他十个小伙子一律是与曾善美同龄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这些小伙子都处在求偶的年龄，就算其中有一半在来到科联前就已经有了女朋友，那么剩下的一半里，喜欢曾善美与不喜欢曾善美的人还应该各占一半吧？当然，你会说我的计算很牵强，实际上我根本用不着这么计算，只需要根据常识来进行推断。按照我们的常识，在男女比例为10：1的工作环境里，那个硕果仅存的女孩子一定会成为众人争相取悦的对象，平衡得不好还会弄出争风吃醋之类的事情来呢。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科联开发部里的这十一个年轻人相安无事，谁也不曾招惹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曾善美对异性缺乏吸引力。

我说曾善美缺乏吸引男性的气质，是从开发部的平静气氛这一结果倒推回来的。但这仍然只是理论，下面我们看看实际。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曾善美是这样出场的：她披着一件蓝色劳动布的大棉袄坐在开发部的角落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种装束，的确很难对异性产生吸引力。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衣服虽不好，但也要看是谁在穿。要是曾善美的女朋友辛灵穿，没准儿也能穿出一种别开生面的效果。辛灵有那么一种俏皮灵动的劲儿，随便一件衣服，都能让她穿出味道来。曾善美相比之下，就显得木讷一些。这种木讷，并非是由于智商低而造成的那种反应迟钝。曾善美毕竟是个学物理的大学生，口算心算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功夫绝对不会低于常人。曾善美的木讷，用现在的词汇来说，就是情商有问题。只是在1991年，“情商”这个词也还没有

出现。而我，也不太愿意用一个十年后才出现的词去解释一个十年前的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好，现在我就用十年前的词汇来解释曾善美的木讷，以及为什么这种木讷会导致她对异性缺乏吸引力。曾善美之木讷的本质是什么呢？咱们还是从解剖细节开始吧。首先，让我们再看一眼她出场时的这身装扮：这件蓝色劳动布的大棉袄。猜猜看，在北京的7月里，她披上这么一件行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是为了御寒，一件彩色的粗棒针毛衣就足够了，为什么是一件蓝色劳动布的大棉袄呢？这件棉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当然，有些许过分并不要紧。如果曾善美对自己的过分举动保持着一种自觉，如果她的言谈能与她的举止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那么，她还可以因此而流露出一种幽默感。但是，她没有。

科联开发部的这十一个员工来自几所不同的学校，其中有两个北大的，两三个清华的，另外还有南京工学院的，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工程学院的等等。这里的每个人谈起自己的母校来，除了幽默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二种态度。比如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要将自己的母校简称为“北京妓院”，比如清华大学电机系的要称自己毕业于“青蛙大学田鸡系”。关于北大，可供幽默的题材就更多了。就拿女生宿舍每晚十一点必须锁门这一点来说吧，你随便问一个北大女生：“你们宿舍还实行宵禁吗？”她要是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规定真不合理。”那她就是一个老土，一个过时的人物。虽然她有不平之气，可你不妨认为她是一个木讷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大多数女生都会灵活地调侃说：“当然宵禁呀！不过这对我们没什么妨碍。因为每晚